

# 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

## 上編：大學之源頭、理念與性格

### 一、現代大學之源頭與原義

大學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國的先秦，西方的希臘與羅馬，但現代大學之直接源頭則是歐洲中古世紀的大學。大學是中古的特殊產物，中古是宗教當陽稱尊的世紀，它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向來是學術上纏訟不休的事，但沒有人否認大學是中古給後世最可稱美的文化遺產。

University 一字原無確指，與 community、college 二字通用，之後，則成為一種特殊的「基爾特」(guild) 之稱謂。與英文 university 一字最接近的中古稱謂是 studium generale，它是指「一個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的地方」，而非指「一個教授所有課程的地方」。而中古時 universitas 一字則指一群老師宿儒 (masters) 或一群學生所組合的學術性的「基爾特」而言。到了十五世紀，studium generale 與 universitas 二字變成同義，都變成英文 university 的前身了。<sup>1</sup>

---

1. 參 Hasting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895), eds. F. M. Powicke and A. B. Em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vol. 1, chapter 1°.

中古大學中以法國的巴黎大學、意大利的勃隆那(Bologna)為最早，或稱為中古大學之原型。兩者皆是十二世紀出現者，其他如英國的牛津、劍橋，意大利的薩里諾(Salerno)，德國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大學的佼佼者。中古大學與宗教不能分，大學最早是寺院型態，十三世紀則是教堂型態，之後才成為基爾特性格，並從宗教中逐漸解放出來。就今日的大學來說，牛津與劍橋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學的原趣的，至少牛劍是從中古一脈相傳下來，在七、八百年無數的變遷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性格的。

中古大學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國界的性格。十四世紀歐洲在學問上有其一統性，它有一共通的語言(拉丁)，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師和學生可以自由地雲遊四方，從勃隆那到巴黎，從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裏，甲大學的學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國乙大學學者的款待，論共通的書，談共通的問題，賓至如歸。中古大學的「世界精神」後來因拉丁語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體，直到十九世紀末時才又漸漸得到復蘇，至二十世紀則又蔚為風氣。現代大學的「超國界」性格的基礎則不在共同的語言或宗教，而在科學的思想，而在共認的知識性格。此所以現代大學之間常有學術會議、交換計劃等等。

## 二、大學的理想與性格

大學的理想和性格幾個世紀來已發生許多的變化。第一本給大學系統性地刻劃一個明確的圖象的重要專著也許是

十九世紀(1852)的牛津學者紐曼的《大學之理念》。<sup>2</sup>紐曼認為大學是一個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紳士的地方(雖然他也認為大學可以訓練職業人才)。他以為大學之目的在「傳授」學問而不在「發展」知識。他說：「如果大學的目的在科學的與哲學的發明，那麼，我看不出為什麼大學應該有學生。」紐曼之書為論大學之經典。他心中大學所應培育之紳士乃指通達而有修養與識見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響英國教育甚巨，亦是十九世紀牛津、劍橋之教育蘄向。簡言之，紐曼之大學理想著重在對古典文化傳統之保持，教育之目的則在對一種特殊型態之人的「性格之模鑄」(character formation)。紐曼的大學之理念顯然是「教學的機構」，是培育「人才」的機構。這個理念也許是古典大學遺留給今日大學教育最重要的遺產。

十九世紀末時，大學的性格開始巨大的形變。這一改變始於德國。德國大學亦由中古一脈相傳而來，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時，在洪堡德及阿爾托夫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學首先舊瓶裝新酒，徹底改制，擺脫中古的學術傳統，標舉大學的新理念。他們大學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學為「研究中心」，教師的首要任務是自由地從事於「創造性的學問」。每個學生則如洪堡德所說，應該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識金廟」上置放一塊磚石。這種大學的理念與紐曼所懷抱者迥然不同，因為它所重者在「發展」知識而不在「傳授」知識。當然，大學仍把「教學」看作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國這種大學的新理念逐漸

---

2. John H. Cardinal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1852), N.Y.: Images Books, 1959.

影響到歐洲各國，並對美國大學發生根本性的衝擊。中國現代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學就是以德國大學為模式的。在二十世紀初時，德國確成為世界大學的耶路撒冷。

德國大學的新理念，在美國大學的先驅者佛蘭斯納的《大學》<sup>3</sup>一書中獲得系統性的闡揚。佛蘭斯納的《大學》一書成於1930年，已被公認為一部論大學的現代經典。他在該書第一篇就標舉出「現代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他特別強調「現代大學」，以別於早他七十幾年的紐曼之「大學」。佛蘭斯納肯定「研究」對大學之重要，肯定「發展」知識是大學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卻給「教學」以同樣重要的地位。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學」；也即大學之目的不止在創發知識，也在培育人才。佛蘭斯納對大學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為大學必須是一「有機體」(organism)。他贊成大學應該探討「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藝世界」的種種知識，但他反對大學訓練「實務人才」，反對大學開設職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之課程，他也反對大學無限的擴大以破壞它的有機性，他更極力反對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社」(service station)。他強調大學應該是「時代的表徵」，但他不以為大學應該隨社會的風尚、喜惡而亂轉，他並不以為大學應該是「象牙塔」，但他強調大學應嚴肅地批判地把持一些長永的價值意識。

論大學理念的書與文，不知凡幾，但德國哲人雅士培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sup>4</sup>一書卻值得特別

3.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aperback 1968.

4. Karl Jaspers,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ed. Karl Deutsch, London: Peter Owen, 1960.

一提。雅士培此書成於希特勒 (A. Hitler) 統治崩解，德國大敗，德大學受創極深之際。他以哲人之智慧，籌思人類學術的路向，發揮大學之理念。雅士培以大學之使命只在忠誠於真理之探尋。在他，大學乃是一師生聚合以追探真理為鵠的之社會而已。他認為大學乃為對知識有熱情之人而設。真正的大學必須具有三個組成，一是學術性之教學，二是科學與學術性的研究，三是創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則必歸於衰退。雅士培特別強調大學是「知識性的社會」(intellectual community)，也以此特別強調學術自由與容忍的重要。同時，他也肯定大學教育之目的在模鑄整全的人。這就是他所以主張在教學與研究之外，大學更應措意於創造性之文化情調。從理想上說，師生之間應該有蘇格拉底式的對話。雅士培重視大學之尊嚴與獨立性，以大學為「國中之一國」，但他不以為大學可遺世獨立，故他極力主張把「技術」(technology) 引進大學，並以為技術在大學應佔一中心位置。(許多古典大學如牛津、劍橋都以技術不登大雅之堂，而長久以來均加以拒斥。但目前則已有變。就此點言，劍橋的艾雪培爵士可說是雅士培的同道，艾雪培且高唱出「技術人文主義」的理論。<sup>5)</sup>雅士培相信組織的整全性，大學的整全性，他認為了解事物現象之整全性是人之求知慾的鎖鑰。但知識之發展卻不能不靠分工，知識的深度尤不能不依賴學術的專精。事實上，學問上分為院系可以追索到中古大學。雅士培不反對學術之專門化，但他強調知識應該有一整全的存在。

5. Eric Ashby, *Technology and the Academics*, London: Macmillan, 1966. 此可參拙文〈二個文化的對壘與技術人文主義——對劍橋教育的一些觀察〉。

大學應該是一有機的整體，在中古大學，這種整全性與有機性是存在的，但他以為今日的大學都成為一組無所關連的學科的聚合，並沒有整全的有機性。當然，我們不能回到中古，但現代不斷膨脹的知識與研究又應如何在大學中加以整合呢？關於這一點雅士培與佛蘭斯納一樣，都提出了很多的理念，很好的問題，但卻並沒有真正有力的答案。

自二次大戰之後，大學教育在世界各地都有蓬勃的發展。而在美國尤其獲得快速與驚人的成長。在1876年前，美國只有書院 (college)，還談不上有真正的大學，而此後在吉爾曼 (Daniel Gilman) 與艾略特 (Charles Eliot) 等人的改革發展下，步德國大學的後塵，才一步步提高大學的水準。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大學不但在量上言為舉世之冠；在質上言，其一流學府，如哈佛、柏克萊、芝加哥、耶魯等較之歐洲任何大學亦毫不遜色且或更有過之。時至今日，論者幾莫不以美國為當代大學之重鎮。美國大學之發展自與其國力交光互影，彼此影響著。講美國大學，當然需知其品流參差，但我們所應注意者則是那具有領導性地位的大學，看看她們的理念與性格。就我所知，對美國大學之發展極深入了解而能掌握其精神面貌的是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克爾的《大學之功能》一書，<sup>6</sup>其論點與見解極多挑激性，是了解當代大學不可不讀之書。美國的先進大學，一方面承繼德國大學重研究之傳統，一方面也承繼英國大學重教學之傳統。我們可說，美國的研究院採德國模式，大學部則多少受英國影響。但當代的美國大學，如克爾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

---

6. 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N.Y.: Harper Torchbooks, 1963. 美國當代大學之面貌與問題，亦可參 Robert S. Morison, ed.,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U.S.A.*, Boston: Bacon Press, 1967。

發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國的大學狂熱地求新，求適應社會之變，求趕上時代，大學已經徹底地參與到社會中去。由於知識的爆炸及社會各業發展對知識之倚賴與需要，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 之重地。學術與市場已經結合，大學已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服務站」。象牙塔內與象牙塔外的界線越來越淡漠，甚至泯滅了。大學內部則學生可以多達五、六萬，甚至十萬以上；學術之專化更是驚人，如整個加州大學課程之多竟達一萬門之數，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無法作有意義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著力所在多係研究，教學則越來越被忽視。教授的忠誠對象已不是大學，毋寧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會、西屋公司或華盛頓。一個教授所關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評價，而是其他大學乃至其他國家的大學的同行的評價。大學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它的成員已不限於傳統的教師、行政人員和學生，還包括許多「非教師」的教學人員(如研究教授)，它的組織已不止限於學院(faculty)、書院(college)，還包括無數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換計劃中心……它的活動已不止限於研究、教學，還包括對外的諮詢，與國外的合作(加州大學的研究計劃涉及五十幾個國家)等等。總之，在數量、組織、成員、活動各方面，今日美國的大學與以前的大學已大大不同。這種大學的理念及性格與紐曼的構想固然相去十萬八千里，與佛蘭斯納、雅士培的構想也迥然有別。克爾認為紐曼心目中的大學只是一「鄉村」，佛蘭斯納心目中的大學也只是一「市鎮」，而當代的大學則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克爾對美國大學的巨變雖然認為不是沒有問題，但他顯

然是樂觀而正面地加以肯定的。他同意哥頓 (D. S. Gordon) 所說真正的美國大學，還在未來。但他肯定今日的美國大學將成為世界各大學的模型。克爾給今日美國大學一個新的稱呼，即 *multiversity* (勉譯為「綜集大學」)。因為它的性格已不是 *university* 一字所能表達了。克爾的 *multiversity* 一詞確是神來之筆，因為它的確很象徵化地表顯了當代大學的性格。誠如他所說，今日大學不再是佛蘭斯納所說的「有機體」，不再具有統一性，而毋寧是一多元體，並具有高度的多樣性。他老老實實地說，*multiversity* 不是一個和諧合調的組織，它也不是一個「社會」(如雅士培所說的大學是一「知識性的社會」)，而是許多個不同的社會，或者說是一個多種目的之多元性社會。在此，我們先不必對克爾的「綜集大學」的概念加以批評，但要指出，克爾的確很有力而生動地描繪了當代美國居領導地位之大學的性格與動向。事實上，他並沒有太誇張，美國這種大學的理念與性格確已越來越為其他國家的大學有意或無意地視為模型。

### 下篇：對大學一些問題的探討

在上篇，我們已作了一些對大學之源頭、理念與性格的論述。這些看法只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當然不能說沒有其他的看法。事實上，「什麼才是一真正大學？」並非容易有一絕對的答案，且常是爭論不休的。同時，我們要知道，大學不是存在於社會的真空的，它是大社會的一個組成。因此，大學的理念與性格不是常永不變的，它不能不因社會之變而有變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大學在教育民主化及知識

爆炸的刺激下，大大發展，但大學，特別是克爾的「綜集大學」，也出現了種種問題，甚至可慮的危機。<sup>7</sup>在這一篇裏，我將提出今日大學所面臨的一些共同問題與挑戰，以供大家思索與探討。

### 三、專精與通博

大學教育，自古分科，孔門之學即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南朝宋文帝將大學分為「玄」、「儒」、「文」、「史」四學。西方中古大學亦分文法、修辭及邏輯三科，或算術、幾何、音樂及天文四科。學術需專攻，應是無可置疑的。但今日學術專門化越來越烈，越來越細，不止發生施諾（C. P. Snow）所說二個文化之對壘問題，且是「多種文化之相隔」之問題，不止發生「隔行如隔山」之現象，即使同行之學者亦往往無法溝通其所見所學。「道術分裂」一至於此，學術之深度固然加增，但見木不見林，知識之整全性之掌握則戛戛乎難了。誠然，專業化是學術發展中不可避免的，懷海德且說：「我確信在教育中，你排除專精（specialism），則你摧毀了生命。」<sup>8</sup>今日知識上的許多突破顯然與專業化有關，而就大學教育來說，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至於社會

- 
7. 此可參 Charles Frankel, ed., *Issues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N.Y.: Harper & Brothers, 1959；Theodore Roszak, ed., *The Dissenting Academy*, N.Y.: Vintage Books, 1968；及 James Ridgeway, *The Closed Corporation: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Crisis*, N.Y.: Random House, 1969。Ridgeway 一書有龔念年譯本：《美國大學的危機》，香港：文教出版社，1974。
  8. A. N. Whitehead, *The Aims of Education & Other Essays*, N.Y.: The Free Press, Paperback 1967, p. 10. 教育之必需通過專精之路，而提出極有意義之看法者，艾雪培爵士之書是值得深究的，參註 5。

之職業結構越來越需專門知識的情形下，學生專修一科一系也是必要的，但大學教育畢竟不應只是訓練一技一能之士。一個大學生應該對人類知識文化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對自己民族的學術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賞與把握，同時，他應該養成一種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一種對真理、對善、對美等價值之執著的心態。世界大學莫不對於學科綜合的問題視為知識學上及教育上的重大挑戰。在知識學上如何建立雅士培所說之一有機的整體，煞非易事，即就人文學與科學之整合已經困難重重，更何況集各種學術而治為一爐？至於教育上則歷來莫不在專精與通博上求統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則有多種：牛津之 Modern Greats 合政治學、哲學、經濟學而治之是一途；英基爾大學 (University of Keele) 之將第一年定為「基礎年」(foundation year)，旨在探討西歐文明之背景、遺產、成就及其問題是另一途，通過科際整合之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又是一途。至於美國之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及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徑。<sup>9</sup> 香港中文大學除由大學提供專科教學外，又由書院提供通識教育，亦可說是一條值得走的道路。但專精與通博的平衡之路是仍然值得不斷探尋的！

#### 四、教學與研究

今日主要的大學莫不承認大學不止是「傳道、授業、解惑」而已，它更負有培根 (Francis Bacon) 所倡的「發展知識」

---

9.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 Basil Fletcher, *Universiti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ergamon Press, 1968。